

# 婚姻匹配的变迁： 社会开放性的视角<sup>\*</sup>

李 煜

提要: 本文以择偶配对的内婚性程度作为社会开放性的指标,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6 年数据, 通过对婚姻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在各历史时期变化的实证考察, 评估不平等结构代际传递的过程和趋势。本文在理论上对两种匹配强度组合和代际不平等结构传递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并相应地在模型上使用双配分析方法以控制代际流动的影响, 从技术上实现了对婚姻配对独立净效应的估计。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自致性匹配度大幅度提高, 先赋性匹配呈现倒 U 型的小幅波动。这一结果暗示当前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为“父系再生产强化”模式, 而社会开放性程度可能将有所下降。

关键词: 社会开放性 婚姻匹配 双配模型

社会开放性 (societal openness) 是长期受关注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之一。开放的社会是指, 社会结构中各主要群体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可渗透、易穿越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但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是走向开放还是封闭仍然处于争议之中。市场乐观派认为, 市场打破了旧分层秩序, 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如 Nee, 1996);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逻辑下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如李路路, 2006), 或者得出社会已经“断裂”的结论(孙立平, 2002)。

---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项目编号 08CSH014)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目前阶层状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并获得上海浦江人才计划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转型与发展重点研究项目资助, 特此一并表示感谢。本文曾在 2008 年国际社会学学会 RC28 北京会议 Marriage and Family Session 和复旦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的“巨变 30 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 感谢吴晓刚、Theodore P. Gerber、丁国辉等教授的评论和意见, 文责自负。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 年调查, 由国家教委“211 工程”和香港特区政府大学研究资助局“重点研究项目”(CA03P04, HSS01)资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承担, 项目主持人为边燕杰教授和李路路教授, 特此感谢。

对于社会开放性, 长期以来的研究传统是将代际社会流动作为其衡量指标, 而最近 20 年, 一些学者尝试从婚姻地位配对的角度来研究, 婚姻匹配度成为衡量社会开放度的新指标( Ultee & Luijkx, 1990)。本文将通过对婚姻匹配在各历史时期变化的实证考察, 为中国社会的开放性走向之谜从另外一个侧面提供一个经验回答, 并试图勾勒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特征。

## 一、婚姻匹配与不平等结构再生产

婚姻匹配, 即“谁与谁结婚”, 社会学家经常从“阶层内婚制”的角度来讨论夫妻匹配模式, 是指人们在择偶时遵循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群体内挑选配偶这一婚配模式( 张翼, 2003)。

在传统社会的择偶实践中, 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家庭通常会鼓励子女在本阶层内部通婚, 强调“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 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包办婚姻的婚姻制度安排对后代的择偶行为予以控制, 有意无意地设置婚姻壁垒阻止下层社会成员的“高攀”行为。由此, 婚姻关系的建立也就成为维持现有社会结构、增进阶层内部团结的工具( Goode, 1959), 甚至被认为是阶层凝聚力和认同形成的基础, 是阶层代际传递和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 Haller, 1981)。

在现代社会,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和自由恋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加上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令地域流动和社会地位流动日益频繁, 传统的择偶控制手段已经难以奏效。所以现代化理论预期, 传统婚姻的阶层内婚制特征将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式微。而阶层内婚性的削弱, 意味着阶层界限的模糊、阶层间的融合和社会开放性程度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 婚姻配对的内婚性程度与代际的社会流动性、阶层间社会交往程度一起构成测量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三大主要指标。

西方学界对婚姻配对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Glass, 1954; Lipset & Bendix, 1959), 其核心的问题是, 择偶的内婚性是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被削弱。在研究策略上, 卡米金( Kalmijn, 1991)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模仿“地位获得模型”( Blau & Duncan, 1967) 的理论框架, 区分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婚姻配对: 先赋性匹配比较择偶双方的家庭背景, 看是否“门当户对”, 它是从代际阶层再生产的角度测量社会的

代际开放性程度;自致性匹配是从婚姻当事人个人的角度,看婚姻双方在职业、教育等方面是否“般配”,侧重考察新一代阶层的建构过程及其固化程度(李煜、陆新超 2008)。

本文试图强调的是,婚姻匹配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自我建构、复制和再生产过程。婚姻双方社会地位的匹配与否,对社会结构的强化、延续或重构均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当人们在择偶时遵循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群体内挑选配偶这一同类婚配模式(homogamy)时,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将完整地在下一代家庭的地位结构中被复制出来,婚姻不但没有起到削弱个体间不平等程度的作用,而且将通过代际传递将既有不平等结构复制、传递给下一代;而如果婚姻双方的社会地位是随机匹配的话,以新建家庭为构件的新不平等结构,其不平等程度将明显降低。这将减弱上一代不平等结构向下一代的传递和延续,从而冲击和解构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婚姻双方社会地位的匹配程度不仅是评估社会结构开放度的有效指标,而且是研究不平等结构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化理论曾经乐观地预测:因为工业化和爱情的作用,现代社会在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上均将下降(Treiman,1970;Kerr,1983)。但现实可能并非如此,这两种类型的匹配可能出现方向不同的变动趋势,即有可能发生一种配对增强的同时,另外一种配对强度在下降。因此笔者认为,先赋—自致框架的分析张力不仅在于将原来含混的阶层内婚概念进行有效的澄清和区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这两种匹配的发展趋势和强弱组合的分析,进一步讨论其对不平等结构在代际传递中的后果,这为讨论社会开放性的现状和趋势开拓了一个新的分析空间。而据笔者所知,这一点在中外文献中均未曾有充分的讨论。两种匹配强度和代际不平等结构传递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配对类型强弱趋势组合下的不平等结构后果

		先赋性配对 (门当户对)	自致性配对 (般配)
结构固化	双重分割	强	强
	复制	强	弱
	替换	弱	强
结构弱化		弱	弱

当一个社会婚姻匹配的状况是先赋性配对很强、自致性配对也强的情况下,以新一代家庭为基本元素的社会结构将出现双重分割的特征:上一代的不平等分割完全保留,新一代的不平等分化得到强化。如果我们把社会成员简化类分成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将形成4个通婚圈:精英家庭出身的新一代精英相互通婚、精英出身但沦为大众的子代间相互通婚、大众出身的精英相互通婚、大众的大众子弟通婚。这4个通婚圈正好是以家庭出身是否精英、第二代是否精英交叉割裂,即按照先赋性和自致性两个维度分割,故称为“双重分割”。同理,如果一个社会的先赋性和自致性配对均弱,就是“结构弱化”,社会不平等格局将因为婚配双方的异质性而被逐渐削弱。

当先赋性配对强、自致性配对弱的情况下,上一代的阶层分割完全没有打破,但新一代的阶层固化被遏制。于是只有两个通婚圈,原来精英的子弟通婚,原大众子弟通婚,这时只存在一个分割,即家庭出身。这个分割完全是旧分层格局的“复制”。

而当先赋性配对弱、自致性配对强的情景下,上一代地位分割被完全打破,即无论出身如何,婚姻配对以新一代的阶层分化为依据,因而新的分层结构被强化,旧分层格局弱化。这时婚配圈也只有两个,它完全依据新一代是否成功、是否成为精英来划分,而不计是否出身于精英。新一代的不平等结构因此“替换”了上一代旧分层结构。

不同门当户对和般配强弱程度的组合传递社会不平等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双重分割”、“复制”和“替换”均属于结构代际强化或固化的一种形态,复制是重复上一代的不平等,替换是以新生成的不平等代替旧结构,而双重分割则重叠了新旧两种不平等结构。只有在先赋和自致配对性都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的不平等才因为婚姻而有所下降。

以上理论类型的划分试图描绘择偶配对方式强弱组合下的结构化后果。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即这个社会存在一定数量的代际流动。如果一个社会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极端固化,因为两代之间社会地位高度一致,导致讲求门当户对也就是追求般配,在这个意义上,“双重分割”和“替换”都将变成“复制”模式。虽然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情况下,每个社会都存在一定数量的代际继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际继承的水平(或者说代际流动的水平)是可能发生上下波动的,这将令我们难以分辨所观察到的婚姻匹配是代际继承变化的后果还是

匹配强度的真实改变。<sup>①</sup>我们必须能在技术上对代际继承的效应予以有效控制和估计,才能真正分辨出先赋—自致配对的独立净效应,并结合相应代际继承状况,真正有效地描绘其结构后果和变迁的趋势。本文的研究企图即在于,技术上实现对配对的独立净效应的估计,一方面作为测量当前社会开放性的一个指标,另外一方面通过对各历史时期该效应变动的展示,为未来不平等结构的趋势提供预测的参考。

## 二、社会背景和研究假设

1949年后的中国可以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30年是以“再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后30年是改革逐步推进、市场化原则日益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分层制度。与工业化市场国家不同,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社会分层秩序的特征是,资源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由国家依据政策或需要在不同的地区、经济部门和各种组织类型间由上至下地进行配置。而且,各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与市场经济下职业分层体系不同,专业技术人员的报酬偏低,党政干部则处于分层体系的上端。在这一体制下,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不仅受其职业影响,还取决于其所在地区、工作单位类型和级别,以及个人在政治分层体系中的地位(边燕杰等,2006)。

1978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社会分层格局发生了两方面的巨变,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原则的逐渐确立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资本对个人的收入回报增加,“铁饭碗”被打破,各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越来越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趋同。与此同时,以收入差异为指标的经济不平等迅速扩大,从原来的“去分层化”社会(Parish,1984)转变成社会分化十分明显的国家之一。从历年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动中可以发

---

① 当代际流动水平和婚姻匹配的先赋—自致模式同时变化时,社会结构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变迁结果。而且,在社会继承水平较高的社会,自致性匹配程度可能会被高估。比如在传统社会代际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观察到的较高夫妻间自致性般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先赋性门当户对配对的结果。

现,收入差异迅速拉大发生在1992年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之时(陈宗胜,1991,2000;李实,2003)。有学者将改革前后社会分层秩序变迁的特征归纳为从“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的转化(李强,1997)。

为了更清晰地描绘改革进程中的变化,本文把1949年后分为3个时期:改革以前(1949-1978)、改革初期(1979-1992)和改革深化时期(1993年至今)。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为改革两个阶段的节点,前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在后一阶段,市场原则得到政治合法性,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这样,通过比较改革初期和深化时期可以把握市场化渐进进程对择偶般配的影响,同时与改革前相对比,显示不同分层秩序下择偶匹配模式的差异。

在婚姻择偶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以“门当户对”为特征的先赋性配对,并曾经主要以“包办婚姻”的方式实现家庭和家族对子女择偶的控制(Whyte & Parish,1984)。1950年的新婚姻法确立了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原则,反对包办婚姻,禁止买卖婚姻、纳妾、童养媳和换亲等。在此后10年,新婚姻法在全国得到了有力的推行和实施。年轻人,特别是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婚姻自主性,家长对子女婚姻的控制能力下降(Meijer,1971)。但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对个人私生活有一定的控制。现有研究表明,单位对择偶的直接干涉总体上不多,但制度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强化了政治身份的“门当户对”:如阻止党团员、干部、军人、机要人员、“培养对象”与出身和成分有“污点”的异性交往结婚(李煜、徐安琪,2004)。

改革后,单位逐渐放弃了对个人私生活的行政控制,市场化进程也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地域流动和地位流动。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私人空间,择偶过程不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成了个人的选择,爱情在择偶过程中的作用上升。

基于以上社会状况,择偶匹配上的同质性变迁处于市场化变迁和浪漫爱情两种不同力量的张力之中,并可以相对应地提出两个相悖的研究假设。

### (一) 市场化变迁影响假设

有研究提出,在市场转型和机会竞争加剧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将走向封闭,阶层间的壁垒强化(Gerber & Hout,2004)。从中国改革前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人们在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

原单位体制所给予的庇护,社会个体和家庭直接面对和承受着市场化进程造成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和不断增加的市场风险,这会给婚姻当事人带来相当的现实压力。我们有理由预期在择偶过程中,为了应对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环境,为未来的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婚姻双方将比以往更慎重地考察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事业发展潜力,而教育无疑是其中最好的指标之一。有研究者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证明,在80年代以后,婚配当事人双方的教育般配出现了快速增强的趋势(李煜,2008)。于是有:

研究假设1:择偶的同质性将随着改革进程不断上升;

研究假设1亦可以具体细化为:

研究假设1a:先赋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上升,

研究假设1b:自致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上升。

## (二) 浪漫爱情假设

浪漫爱情的盲目性是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潜在威胁,所以在传统社会的择偶实践中,强调“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包办婚姻”的婚姻制度安排对后代的择偶行为予以干涉(Goode,1959)。按照现代化理论,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地域流动频繁、传统的包办婚姻式微,家庭对子女择偶的控制将会减弱,异性青年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频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随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和自由恋爱的观念深入人心,基于浪漫爱情的择偶将成为婚姻的主要形态。教育、收入等虽然仍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但情感性、心理性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人品、个性、兴趣相投、有共同语言等成为婚姻的重要前提。所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单位和个人对择偶控制的进一步减弱、年轻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日益现代化,在浪漫爱情的假设下,婚姻匹配的同质性水平应该出现下降的趋势(Ultee & Luijckx,1990; Smits et al.,1998)。所以有与研究假设1相对立的:

研究假设2:择偶的同质性将随着改革进程不断下降;

研究假设2a:先赋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下降,

研究假设2b:自致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下降。

### 三、数据和模型

本文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6) 的资料,以择偶双方的教育成就和父亲阶层为指标,展示各时期择偶匹配的变迁状况。整理数据后得到有较完整初婚资料的加权样本共 8014 对夫妻,并将初婚年份划分为三个时期:改革以前(1949 - 1978)、改革初期(1979 - 1992)和改革深化时期(1993 - 2006)。家庭背景以父亲的阶层(非体力、体力和农民)为指标,夫妻的配对以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为指标。

与传统单配方法 (single-trait model) 孤立地分析先赋性或自致性匹配不同,本文采取双配分析模型 (dual-trait model) 将这两个匹配维度置于同一个模型中同时进行分析 and 估计。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它在技术上实现了有效地控制代际继承因素,分解先赋性、自致性匹配各自的独立影响,得到对婚姻匹配程度及变动状况的可靠估计 (Uunk & Ultee, 1994, Uunk, 1996)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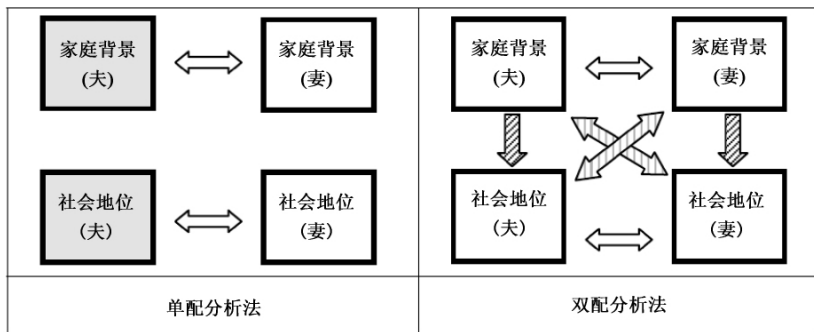


图 1 单配与双配分析的比较

从统计上而言,传统单配分析在加入时期变动后 (period layer) 是独立的两组三维表,而双配分析则是包含丈夫文化程度 (H)、妻子文化程度 (W)、丈夫家庭背景 (F)、妻子家庭背景 (M) 和结婚年代 (C) 的  $4 \times 4 \times 3 \times 3 \times 3$  的五维表。模型定义如下:

$$\log(F_{ijkle}) = \mu + \mu_i^H + \mu_j^W + \mu_k^F + \mu_l^M + \mu_c^C + \mu_{ic}^{HC} + \mu_{je}^{WC} + \mu_{kc}^{FC} + \mu_{le}^{MC}$$



$$+ \phi_c^{HW} \psi_{ij}^{HW} + \phi_c^{FM} \psi_{kl}^{FM} + \phi_c^{FH} \psi_{ki}^{FH} + \phi_c^{MW} \psi_{kj}^{MW} + \phi_c^{MH} \psi_{li}^{MH} + \phi_c^{FW} \psi_{kj}^{FW} \quad (\text{公式 1})$$

公式 1 的第 1 行表示分结婚年代的各变量边缘分布,第 2 行以对数相乘层阶效应模型(log-multiplicative layer-effect model, 参见 Xie, 1992) 来捕捉四个变量间 2 维交互的关联模式( $\Psi$ )和时期间 2 维关联水平的相对变动状况( $\phi$ )。公式 1 中各项 2 维交互的含义分别是: HW 和 FM 代表自致性和先赋性配对的同质性程度, FH、MW 分别代表丈夫和妻子的代际继承性(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MH、FW 代表个人自致成就与婚姻对方家庭背景的交流效应(exchange-effect) (Uunk, 1996: 23 - 24)。

公式 1 所代表的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估计双配分析中所有的 2 维关联度,但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先赋性和自致性配对的时期变动情况,所以希望能完全控制代际继承性的作用。出于这个考虑,计算时同时估计了公式 2 模型,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获得可靠的结论。公式 2 是:

$$\log(F_{ijklc}) = \mu + \mu_i^H + \mu_j^W + \mu_k^F + \mu_l^M + \mu_c^C + \mu_{ic}^{HC} + \mu_{jc}^{WC} + \mu_{kc}^{FC} + \mu_{lc}^{MC} + \mu_{kic}^{FHC} + \mu_{ljc}^{MWC} + \phi_c^{HW} \psi_{ij}^{HW} + \phi_c^{FM} \psi_{kl}^{FM} + \phi_c^{MH} \psi_{li}^{MH} + \phi_c^{FW} \psi_{kj}^{FW} \quad (\text{公式 2})$$

公式 2 与公式 1 的差别在于,以丈夫和妻子双方的家庭背景、本人教育获得和结婚年代的三阶交互效应( $\mu_{kic}^{FHC}$  和  $\mu_{ljc}^{MWC}$ ) 取代原来的  $\phi_c^{FH} \psi_{ki}^{FH}$  和  $\phi_c^{MW} \psi_{kj}^{MW}$  估计,这样就完全控制了代际继承的作用。另外,为了得到对代际继承性时期间变化的可靠估计,我们也估计了在控制了四项同质性程度和交换效应与初婚年代的三阶交互效应后(公式 3),丈夫和妻子的代际继承性的变化( $\phi_c^{FH}$  和  $\phi_c^{MW}$ )。

$$\log(F_{ijklc}) = \mu + \mu_i^H + \mu_j^W + \mu_k^F + \mu_l^M + \mu_c^C + \mu_{ic}^{HC} + \mu_{jc}^{WC} + \mu_{kc}^{FC} + \mu_{lc}^{MC} + \mu_{kic}^{FMC} + \mu_{ljc}^{FWC} + \mu_{lic}^{MHC} + \mu_{ijc}^{HWC} + \phi_c^{FH} \psi_{ki}^{FH} + \phi_c^{MW} \psi_{kj}^{MW} \quad (\text{公式 3})$$

### 四、模型选择过程和结果

本文模型使用 Lem 软件计算(Vermunt, 1997),表 2 报告了模型选择的过程,模型选择的思路是从独立模型开始,引入各项效应及其时期变动后,形成全模型(full model)。再对全模型进行精简,以最少的自由度消耗取得最大的解释力。具体而言就是以全模型为基准(baseline)用向后选择的方法(backward method)对各  $\phi_c$  逐个进行诊断,不

显著的  $\phi_c$  项予以剔除。需要强调的是,  $\phi_c$  项不显著并非意味着该效应不存在, 而是表示该效应在三个时期间的变化不显著。

表 2 中模型 1 是独立模型, 模型 2 加上了初婚时期与各变量的交互效应, 控制了边缘分布的时期间变动。模型 3a 是全模型, 即公式 1, 模型包含四个变量间六项的关联  $\Psi$  及其时期间变动参数  $\phi_c$ 。模型 3b

表 2 家庭背景匹配与教育匹配的双配趋势分析(1949-2006)

	模型	$L^2$	自由度	BIC	备注
<b>1</b>	<b>独立模型</b>				
	C + W + H + M + F	9963	419	6198	
<b>2</b>	<b>边缘分布 * 同期群</b>				
	(1) + CH + CW + CF + CM	7508	399	3922	
<b>3</b>	<b>双配趋势分析</b>				
a	(2) + fluctuation in all association (varied $\phi_c$ )	469	350	-2677	全模型 (公式 1)
b	(3a) + constraint $\phi_c^{MW} = 1$	469	352	-2695	
c	(3b) + constraint $\phi_c^{FW} = 1$	470	354	-2712	
<b>d</b>	<b>(3c) + constraint <math>\phi_c^{MH} = 1</math></b>	<b>477</b>	<b>356</b>	<b>-2723</b>	<b>最佳模型</b>
e	(3d) + constraint $\phi_c^{FH} = 1$	502	358	-2716	
f	(3d) + constraint $\phi_c^{FM} = 1$	501	358	-2717	
g	(3d) + constraint $\phi_c^{HW} = 1$	519	358	-2698	
<b>4</b>	<b>双配趋势分析( Saturated FHC &amp; MWC)</b>				
a	(2) + FMC + MWC + fluctuation in HW FM MH and FW association	422	330	-2545	全模型 (公式 2)
b	(4a) + constraint $\phi_c^{MH} = 1$	423	332	-2562	
<b>c</b>	<b>(4b) + constraint <math>\phi_c^{FW} = 1</math></b>	<b>424</b>	<b>334</b>	<b>-2578</b>	<b>最佳模型</b>
d	(4c) + constraint $\phi_c^{HW} = 1$	463	336	-2557	
e	(4c) + constraint $\phi_c^{FM} = 1$	448	336	-2572	
<b>5</b>	<b>双配趋势分析( Saturated HWC FMC MHC &amp; FWC)</b>				
a	(2) + FMC + MWC + fluctuation in FH & MW association	410	308	-2359	全模型 (公式 3)
<b>b</b>	<b>(5a) + constraint <math>\phi_c^{MW} = 1</math></b>	<b>411</b>	<b>310</b>	<b>-2376</b>	<b>最佳模型</b>
c	(5a) + constraint $\phi_c^{FH} = 1$	423	310	-2363	

到 3g 是检验六项  $\phi_c$  时期变动是否显著,模型选择主要是依据 BIC 是否为更小的负值,以及嵌套模型(nested model)间  $L^2$  (Log-likelihood Ratio) 差异的  $\chi^2$  检验,结果交换效应( $\phi_c^{FW}$  和  $\phi_c^{MH}$ )<sup>①</sup>和妻子的代际继承性( $\phi_c^{MW}$ )时期无差异。模型 3d 是最佳模型。

为了完全控制代际继承对同质性和交换关系估计的影响,模型 4a (公式 2)以丈夫家庭背景(F)、丈夫教育程度(H)和初婚时期(C)的三维完全交互项( $\mu_{kic}^{FHC}$ )取代公式 1 中的对数相乘层序效应项( $\phi_c^{FH} \mu_{ki}^{FH}$ )。同时对妻子的代际继承也做了同样的处理,以  $\mu_{ljc}^{MWC}$  取代  $\phi_c^{MW} \psi_{lj}^{MW}$  项。模型选择的思路同上,最后模型 4c 确定为最佳模型,表明两项交换关系的时期波动( $\phi_c^{MH}$  和  $\phi_c^{FW}$ )均不显著。

为了得到对代际继承性的可靠估计,最后模型 5(公式 3)将同质性和交互关系的四项均以三维完全交互项( $\mu_{lkc}^{FMC}$ 、 $\mu_{kjc}^{FWC}$ 、 $\mu_{lic}^{MHC}$  和  $\mu_{lkc}^{HWC}$ )表示,结果表明妻子的教育成就与其家庭出身之间的关联性在三个时期无差异( $\phi_c^{MW} = 1$ )。

对三组模型的模型选择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无论是先赋性的“门当户对”匹配,还是自致性的“般配”,三个时期的匹配程度( $\phi_c^{HW}$ 、 $\phi_c^{FM}$ )均有显著的变化;

男性代际继承性的时期变化( $\phi_c^{FH}$ )显著,而女性( $\phi_c^{FW}$ )不显著;

在双配分析中的六对关系中,两项交换关系( $\phi_c^{MH}$  和  $\phi_c^{FW}$ )在三个时期的变动均不显著。

存在显著时期变动的参数  $\phi_c$  的估计情况如表 3 所示,是根据表 2 中的最佳模型估计的。

表 3 的统计结果表明:

(1) 改革以来,择偶双方的教育匹配度  $\phi_c^{HW}$  呈明显而稳定的上升趋势。在模型 3d 中,当以改革前(1949 - 1978)为参照组  $\phi_c^{HW}$  取值为 1 时,改革初期的  $\phi_c^{HW}$  上升到 1.169,到 1992 年后迅速上升到 1.567。这一趋势在模型 4c 的再次得到验证,也与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所计算的教育匹配度变迁相一致(李煜 2008)。

① 比较模型 3c 和 3d 模型间  $L^2$  差异是边缘显著( $\chi^2 = 6.805$ ,  $df = 2$ ,  $P = 0.033$ ),但依据模型 4b 和 4c 的  $L^2$  比较,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继承效应未被完全控制的结果,故依据 BIC 选择原则选择模型 3d,并判定  $\phi_c^{FW}$  时期变化不显著。

表 3 家庭背景和教育匹配的参数估计 ( 基于表 2 相应模型)

初婚时期	模型 3d	模型 4c	模型 5b
教育匹配度( $\phi_e^{HW}$ )			
1949 - 1978( 参照组)	1. 000	1. 000	
1978 - 1992	1. 169	1. 138	
1993 - 2006	1. 567	1. 522	
家庭背景匹配度( $\phi_e^{FM}$ )			
1949 - 1978( 参照组)	1. 000	1. 000	
1978 - 1992	1. 232	1. 217	
1993 - 2006	. 920	. 899	
代际继承( 男性 $\phi_e^{FH}$ )			
1949 - 1978( 参照组)	1. 000		1. 000
1978 - 1992	1. 310		1. 267
1993 - 2006	2. 606		2. 208

( 2) 初婚夫妻间家庭背景的匹配(  $\phi_e^{FM}$  ) 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倒 U 型过程, 即三个时期中以改革初期( 1979 - 1992) 为最高, 但波动幅度不是太大。这得到了模型 3d 和模型 4c 的重复验证。

( 3) 男性的代际继承, 即丈夫家庭背景与自身教育成就的关联性(  $\phi_e^{FH}$  ) 有明显的持续增强, 而且继承性在 1992 年后的增强幅度很大, 从改革初期的 1. 267 增加到 92 年后的 2. 208。而女性的代际继承和两个交换效应在时期间的变化不显著, 故在表 3 中略去。

## 五、结论和讨论

### ( 一) 择偶匹配的模式

数据的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1a, 择偶自致性匹配的同质性持续上升, 但先赋性的匹配结果并未如研究假设 1b 所预期的那样持续下降, 而是呈现为起伏不大的倒 U 形波动。其原因可能有二。

#### 1. 改革前后不同的社会分层秩序

跨时期比较的统计分析有一个暗含的假定, 那就是模型所使用指标的效度和信度在不同的时期是前后一致的。如果该指标在不同的时期其理论含义、或测量的准确性存在差异的话, 模型的结果就会失真乃至误导。本文的模型虽然使用的是本领域通用的指标( 文化程度和社

会阶级)来测量社会地位,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再分配”体制下,社会分层的格局与工业化市场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别,户籍、单位类型和政治身份都对个人的生活机会有重要影响,而教育水平和职业阶级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使得仅仅以这两个指标为基础的模式,在展示改革前中国社会择偶状况时,可能会低估当时的匹配同质性。当时教育水平不高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非体力阶级的差别不大。在一个“去分层化”的社会,婚姻的地位匹配可能体现在这两个地位指标所未能有效涉及的其他方面。所以,当自致性和先赋性匹配在改革前表现出低同质性时,并不一定代表当时的青年在择偶时较少地考虑匹配同质性,而可能是所使用的地位指标无法把握两种分层秩序的差异和变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初期(1978-1992)比改革前在自致性和先赋性匹配上的提高,可能只是说明教育和职业阶层指标对旧分层秩序并不敏感,而更适合改革后市场化社会的状况。

## 2. 市场化进程中的匹配同质性

在比较改革初期(1978-1992)和改革深化时期(1993-2006)时,分析发现自致性匹配上升,而先赋性匹配下降。前者支持了研究假设1a,后者则支持研究假设2b,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在贫富分化的格局下,自致性和先赋性匹配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这里作者的初步猜测是,这是青年男女为在市场化现实压力和浪漫爱情之间找到平衡,采取侧重恋人现状和未来发展潜力、而对其家庭背景则并不强求的择偶策略。而且,1992年后先赋性匹配下降在数量上并不大,说明家庭背景在择偶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 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

本文考察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变迁趋势的目的,是在于对中国社会开放性变迁做一描绘,并试图揭示不平等结构代际传递的特征。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的演进呈不同的趋势。从简单的数量关系上讲,自致性匹配度的提高幅度更大,而先赋性匹配下降有限。如果一定要一个简单(也许是过分简化的)回答的话,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暗示中国30年来的开放性程度是有所下降的。

按照表1的理想类型划分,当先赋性配对减低、自致性配对增强时,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代际传递将趋向“替换”的形态。但完全“替换”有一个前提假设,即假定代际间(父子或父女间)完全不存在社会地位

的继承。只要存在代际地位的继承,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替换”。“替换”的程度取决于代际继承的强度,如果代际继承性强,上一代的不平等结构被“替换”得就越少,反之,则“替换”得越多。数据分析表明,从改革后的两个时期来看,在先赋性配对减低、自致性配对增强的同时,代际继承的强度不是不变的,父子间的代际继承性有显著上升,父女间则无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旧不平等结构沿着父子关系的纵向传递水平有所提高。同时,父代地位的男性继承者又在子代层面通过自致性匹配的提高而巩固着新不平等结构(同时,也再生产着继承的旧不平等结构)。这种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父系再生产强化”模式。本质上,它是男性代际继承和子代阶层“替换”双重固化效应的结合。在这一模式下,社会整体开放性水平难以有效地提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济体制转型对于代际流动、职业流动、婚姻配对等社会不同领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可能不尽相同。本文仅从婚姻匹配这一角度为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迁历程、方向和特征做了初步、间接的估计。结论是否全面、可靠,无疑有待更多相关研究成果的验证。但转型时代剧烈的社会分化和市场不确定性压力对社会开放进程和个体选择的深刻影响无疑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主题。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 2006,《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陈宗胜 1991,《库兹涅茨倒U理论统计检验评析》,《学术季刊》第2期。
- 2000,《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李路路 2006,《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强 1997,《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实 2003,《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第2期。
- 李煜 2008,《择偶中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李煜、陆新超 2008,《择偶配对的同质性与变迁——自致性与先赋性的匹配》,《青年研究》第6期。
- 李煜、徐安琪 2004,《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孙立平 2002,《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当代中国研究》第3期。
- 张翼 2003,《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Blau, Peter M. &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Free Press.
- Gerber, Theodore P. & Michael Hout 2004, “Tightening Up: Inter-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Russia, 1988-200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 Glass , David 1954 ,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oode , William J. 1959, "The Theoretical Importance of Lo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 Haller , Max 1981, "Marriage , Women ,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 Kalmijn , Matthijs 1991, "Status Homoga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 Kerr , Clark 1983 ,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vergence or Continuing Diversity?*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 Seymour Martin & Reinhard Bendix 1959 ,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ijer , Marinus Johan 1971 , *Marriage Law and Policy in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Nee , Victor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Parish ,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tson ( ed. ) ,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 - 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s , Jeroen , Wout Ultee & Jan Lammers 1998,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65 Countries: An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Openness Using Country - Level Explanatory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 Treiman , Donal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40.
- Ultee , Wout C. & Ruud Luijkx 1990, "Educational Heterogamy and Father-to-S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23 Industrial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6.
- Uunk , W. J . G. 1996 , *Who Marries Whom? The Role of Social Origin , Education and High Culture in Mat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Nijmegen: Dissertatio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University of Nijmegen.
- Uunk , Wilfred & Wout Ultee 1994, "Homogamy of Social Origin and Education in 12 Industrial N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A Dual Trait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RC28.
- Vermunt , Jeroen K. 1997 , *LEM: A General Program for the Analysis of Categorical Data*. Tilburg , the Netherlands: Tilburg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 Martin K. & William L. Parish 1984 ,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Xie , Yu 1992, "The 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上海高校社会学 E - 研究院  
责任编辑: 杨 可

transi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discover the implic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ense of freedo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 by illuminating these two scholars' understandings.

Local Elites and Rural Social Reconstruction: Conflict between gentry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Movements in Dingxian Experiment ..... *Xuan Chaoqing* 90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local elites included gentry and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s. When Dingxian in Hebe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as the experimental bases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on in 1923 , fierce conflict broke out between the local gentry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Movements ( MEM) presided the Dingxian Experiment. The social conflict , characterized by gentry's complaining , slandering and moulding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 reflecte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gentry in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weakening power and status of rural construction. MEM fostered rural youth to attend the rural construction by organization innovations , which led to the gentry's lost of power. There were two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auses: Firstly ,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economic bankruptcy , the gentry practiced usury and occupied a large amount of land. The economic confliction of the gentry and peasant strengthened the negative evaluations to the gentry. Secondly , gentry class was an obstacle for the country to push forward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ntry. Actually , MEM's ignoring gentry shows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modernization issue.

The Dimension of Measure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Exploration and confirmation ..... *Zhang Qingpeng & Kou Yu* 105

**Abstract:**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ing tool ,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tinues the prototype analysis in previous studies to explore and confirm the dimension of measure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that is endorsed by adolescents. The result suggest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dimensions in the measuring structure of prosocial behavior: altruism , commonweal and social rule ,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trait. The four-dimension model well fits the data , and can provide acceptable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 for the behavioral measurement based on this model.

Trends of Status Homogamy in China: A dual-trait analysis .....  
..... *Li Yu* 122

**Abstract:** Status Homogamy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openness" of society.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study of homogamy to an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



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etween 1949 and 2006.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 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e's education and their fathers' social statuses to demonstrate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marriage choic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ingle-trait model, this study adopts a dual-trait model, placing ascriptive and achievement-oriented match into one single-model simultaneously. It aims at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ffects. The analyses show that, since the reform, the educational homogamy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while the matching of family background draws an up-side-down U-shape curve. These results imply a resurgence of patrilineal society, i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is reproduced and consolidated by unilateral descent.

Meanings of “*Guomin*” and State-building 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Meiji Japan to China's revolution ..... *Guo Taihui* 137

**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phrase “*guomin*” firstly got the modern Western meanings of be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Meiji Japan.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the meanings were more complex. “*Guomin*” in China and Japan shared the same meanings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itizen, such as rights and membership, while it was involved into a network of concepts with other related phrases, implying the strong pursuit for the statism. However, the phrase of “*guomin*” in the two states had many different meanings. After the mid-Meiji period, the phrase tolerated the subject of emperor and the cultural nation, and pushed the mixture between monarchy and pan-nationalism forward; while in late Qing, it became the sign of conflict between constitutionism and republicanism, and came to the nation-state discourse of “Chinese republic”. Modern Japan and China's state-building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reference with the extra-forces, but have taken widely different paths.

**REPORT**

Labor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  
 ..... *Liu Linping, Zheng Guanghuai & Sun Zhongwei* 164

**Abstract:** The “Foxconn Incident” has drawn the social concern and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extensively. Based on the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we find that 14.7% of migrant workers are under high risk of mental disease.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such as students, nurses and citizen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it is related with labor rights significantly. Using the Binary Logit model, we find that, first of all, labor right i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ly, social networks have littl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current labor relationship, we argue that Marx's analysis that labor